

宋·朱熹／集注

四書集注

前 言

任继愈

秦汉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为了加强政治的统一和教化的统一，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定儒家为一尊，用政府的权力推行儒家思想。“五经”成为国家规定的教材。

经书文字简古，传抄不易，传授经典靠记诵，古代没有工具书，识字断句都要有人指点，经典传授必有师承。经师传授，既讲文句，又解释书中的道理，这是经疏章句之学的起源。

汉以后，社会政治不断变化，为不同时代的政府服务的经学也跟着变化，因而经学具有时代特征。汉人解经，受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以天道附会人事，是为“神学经学”。它是汉代巩固统一政权的得力工具。神学经学，是一种比较粗糙的神学体系，但它体现了时代思潮，包容了当时许多学科（如哲学、神学、史学等）的内容。用经学为最高思想指导，有助于推行治国安邦的措施，如引经书决狱、施政等。

唐初编定《五经正义》，融南方经学与北方经学为一

体。它反映了南北朝以后统一的新形势。唐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直到宋朝，一直用来作为明经科取士的标准教科书。维持的时间比汉代的神学经学长得多。但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对抗，社会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五经正义》已不能完全满足施政的要求。唐末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建国，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作为稳定政权统治秩序、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学说，除了儒家经学以外，还有佛教经学、道教经学。为了加强经学的权威性，只有把当时社会思潮诸多文化因素吸收到经学中来，经学才有生命力。建成完整的上层建筑，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汉初董仲舒的经学体系，从汉初算起，经历了约七十年。从《五经正义》的颁布到《四书》的出现，将近四百年。

体现时代思潮的新体系的形成，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政局稳定。战争年月，兵荒马乱中不能出现新体系。第二，充分而必要的思想资料的积累。第三，新体系要有体现时代思潮的思想家。到了北宋中期，才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至南宋，朱熹便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贡献和作用，大于董仲舒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贡献和作用，故陪祀孔庙享受奉祀达七百年之久，直到“五四”时期，朱熹的牌位才被撤除。

《论语》、《孟子》是先秦的著作，《大学》、《中庸》成于汉初，这是学术界的共同看法。这四部分各自独立，不相联属。至于组合在一起，被命名为“四书”，并

得到社会的认可，那是朱熹努力推行的结果。远在南北朝时期，《中庸》一书已受到重视，梁武帝把《中庸》与佛经同等看待，等于说《中庸》已从《礼记》中独立出来。

《论语》在汉代尚不能与《五经》并列，与《孝经》地位相当，起着辅翼《五经》的作用。《孟子》在汉代的地位尚不及《荀子》。唐朝韩愈著《原道》，倡言道统，以与佛教相颉颃，提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有一脉相传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帝王而兼圣人，孔、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有影响的思想家，但不具有帝王的身份，孔、孟的圣人地位，是根据他们的留下来的言行记录：《论语》和《孟子》。柳宗元为佛教辩护，认为佛教讲的道理与《易》和《论语》合，他也把《论语》与《易》相提并论，《论语》也享有“经”的地位。稍后于韩愈的李翱根据《中庸》著《复性书》，发挥圣人之教，唐人已开始注意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重要性。北宋张载少年时，喜谈兵，初次谒见范仲淹，范授以《中庸》，从此张载成了儒家的信徒。可见《中庸》一书从唐到北宋已相当流行，是一部随处可以见到的儒家典籍。

伊川程颐开创洛学，他经常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本教材教育门徒。这四部书成为儒家系列丛书，应当说是从程颐开始的。北宋仁宗庆历以后，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与洛学并峙的有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邵雍、张载许多

学派。这些学派中，有的对这四部书，不完全赞成（如司马光）。所以“四书”虽在北宋受重视，但还未能定型。

“四书”与“五经”并列，公开主张“四书”优于“五经”，那是从朱熹开始的。

韩愈、李翱对《大学》、《中庸》予以阐发，但没有把它们从《礼记》中分离出来。朱熹说：河南程夫子也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子文集》卷82）。朱熹进而说明学习《四书》的顺序，学者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①朱熹对《四书》的研究注释，投入了极大的工力。他对《大学》，加工较多，从中分出“经”及“传”，并改变了原来的次序。还认为格物章有经无传，补写了一篇“传”，即《格物传补》。他的格物说，也曾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和反对。对《中庸》，大体依照程颐的观点，重新分别章节，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对《论语》、《孟子》两书未曾改动，而是博览古今注释，择善而从，称为《集注》。这四部书的合订本统称《四书集注》。

① 朱熹晚年，发现《大学》一书学者不易领会，又提出先从《论语》、《孟子》入手，然后再读《大学》、《中庸》。印书商人因《大学》、《中庸》篇幅小，放在一起，便于装订，其序列为《大学》、《中庸》在先，《论语》、《孟子》在后。明代遵从朱熹说，认为《中庸》为子思作，应在《孟子》前。“四书”顺序的排列，几百年来就成为定型。

朱熹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活动，四十多年时间在讲学、著述中度过。在中国思想家中，对社会发生深远影响的不过三五人，朱熹是其中的一位。究其原因，《四书集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34岁时，为《论语要义》，43岁时为《论语精义》，48岁时成《集注》，此后不断修改、补充。而对《大学》、《中庸》用力最勤。象“格物”一词，在《大学》原著中，还算不上哲学范畴，经过朱熹的注释，“格物”成了他哲学体系的中心结构。后来王守仁与朱熹的理论分歧，也发端于对“格物”的理解。朱熹“格物”说的意义，不在于解释《大学》，而在于建立自己的儒教新体系。

《四书集注》引用汉人以后注解，有董仲舒、司马迁、杨雄等十五家，引用宋人及同时人之说有四十一家。只要朱熹认为可取，即予采纳。但不能把《四书集注》只看做关于字句的注解，它体现了朱熹的全部哲学体系。《集注》解释孔孟的话，有些是孔孟原有的意思，朱熹给予发挥；有些是孔孟原没有的意思，朱熹自己给加上去的。孔子、孟子多处讲仁、义；孔子多论“仁”，孟子多仁义并举。朱熹解释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礼者，仁之发；智者，义之藏。”这些思想都不是孔、孟原有的，孔孟不可能讲得这样深，而是朱熹的发挥。

也有朱熹按照他的理解，发挥孔、孟的原意的。如《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凡诗之

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而惟此一言足以尽其义，盖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朱熹注解的高明处，在于从教育、心性修养方面提出了读《诗》的方法，教人善于从中“得其性情之正”。不象有些卫道之士，板起面孔对经书上的话百般回护，硬要说《诗经》的诗讲的都是大道理，没有任何邪思。这种笨拙的解经法，不符经书原意，也无说服力。朱熹在《诗集传》中已明确指出有些诗为“淫奔之诗”。

《集注》中还随时贯注等级尊卑秩序的思想教育。如《八佾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章，注多解“忍”为“容忍”。朱熹则从忠君的心理感情着眼，解释为季氏对这样大逆不道的潜越行为都忍心干得出，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干不出呢？

封建社会后期的哲学体系，特别强调心、性、情，强调宗教内心修养中忏悔、禁欲、反省和自责的思想感情训练。这种训练是汉唐以来，儒家经典注解中所没有的。一种新思想体系，必须容纳当时流行着的时代思潮，才能推行得开。正象汉代经学必须吸收天人感应思潮才能具有生命力一样，宋代儒教经学的特点在于用心性论来解释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四书集注》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因为它讲的多半是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主要教人如何修身养性，涵养性情，正心诚意。在家为孝子，做官为

忠臣，成贤成圣，不离于人伦日用之间。以心性论解经，是中国经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变革。

《大学》出自《礼记》，是汉初综合先秦、孔、孟、荀儒家各派思想，协调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

《大学》与《中庸》都属于西汉初的儒家著作。（但冯友兰先生认为《大学》为荀子一派著作，《中庸》为孟子一派的著作。）

《大学》的基本内容，即后人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为明德、亲民、止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汉初统一王朝建立后，总汇先秦儒家孟、荀诸流派关于如何协调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封建宗法制度以家为本位，家庭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细胞，因此，对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职责，有明确的要求。《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修身向内心修养方面追求，则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向社会方面推开去，要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一书原来的意义。《四书集注》则把《大学》的纲领解释为“格物”，这是朱熹个人对《大学》的独特的解释。“格物”成为朱熹哲学基本范畴之一，应把它跟“大学”本身的涵义区别看待。

《中庸》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儒家的社会思想，讲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指出为人处世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才是“中庸”。中庸不是两端之间截其平均值，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最合情合

理的行为抉择。难就难在“恰到好处”（适度）。行为的适度，取决于行为者的道德修养水平，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经常遇到的最平常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行为，都能自觉地做去，而且做到“恰到好处”。“君子之道费而难，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第十二章）这种圣人之道，是人生哲学的最高准则。

《中庸》在当时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它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中庸准则，重点在伦理方面。《中庸》中还有一部分关于人性论方面的论述。集中讲到“诚”这个范畴。可惜两汉经学的兴趣在于建立统一的哲学政治思想体系，到处弥漫着天人感应思想，《中庸》中关于人性论的阐发，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响，如《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中庸》把孟子、荀子的人性论给以综合，采取兼容的态度，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兼容并蓄的倾向，从《吕氏春秋》已开始向这一方面努力，因为当时需要统一的哲学体系）。“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中庸》也力图用“天人合一”的理论来解释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

《中庸》对“诚”的作用做了无限夸大，使之神秘化。这种倾向在汉代没有能引起注意，当然也不会发生社会影

响，而被搁置起来。只是经历唐宋几代人的发挥、解释，更主要的是时代的需要，人类认识的深化，心性论的不断从佛、道二教的著作中得到充实。《中庸》又返老还童。

《四书集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四书集注》吸收了唐宋以来的文化积累成果，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建立了完整的儒教思想体系。从帝王到老百姓，都给安排到一个适当的社会岗位上，建立了封建社会成员的全方位的岗位教育，对安定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四书集注》也是一部强化内心修养、涤除心灵杂念的儒教经典，把“正心诚意”、“主敬”、“守一”、“格物致知”、“存诚”，作为人生修养内容，最终目的在于教人成圣贤，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人伦日用之中得到精神解脱，“极高明而道中庸”，贯彻“内圣外王”之道。

第三，《四书集注》打破传统注释的模式，简明通脱，新人耳目。宋儒自称得尧、舜、禹的“心传”，文、武、周公，孔、孟以下千古不传之秘，他们的注解，有的有根据，有的根据不多，也有直抒胸臆不要古代书本根据的。它的特点是摆脱依傍，不受古人的束缚。

司马光《论风俗札子》中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

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温国文正司马文公集》卷6）司马光对当时学风不满，因而发牢骚。其实不能责怪“新进后生”们，因为当时青年中出现的这些议论，是向他们的前辈们学来的。

第四，《四书集注》是适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情的国家教科书，是元明清各代用来开科取士、选拔政府官吏的标准。它的地位，除了靠它的学术成就，还因得到政府政令的倡导。读书人参加国家的各级考试，不能背离《四书集注》的观点，否则难以被录取，这也是《四书集注》流传久远的一个因素。

岳麓书社编辑一套《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这是一个方便读者、普及古典文化名著的好主意。出版社要我为文库中的《四书集注》写一篇序，我高兴地承诺了这一嘱托。

一九八八年七月于北京

目 录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1)

大学章句…………… (5)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21)

中庸章句…………… (25)

论语集注

论语序说…………… (59)

读论语孟子法…………… (63)

学而第一…………… (65)

为政第二…………… (75)

八佾第三…………… (85)

里仁第四…………… (97)

公冶长第五…………… (107)

雍也第六…………… (119)

述而第七·····	(133)
泰伯第八·····	(147)
子罕第九·····	(157)
乡党第十·····	(169)
先进第十一·····	(179)
颜渊第十二·····	(191)
子路第十三·····	(205)
宪问第十四·····	(217)
卫灵公第十五·····	(235)
季氏第十六·····	(247)
阳货第十七·····	(255)
微子第十八·····	(267)
子张第十九·····	(275)
尧曰第二十·····	(283)

孟子集注

孟子序说·····	(287)
梁惠王章句上·····	(291)
梁惠王章句下·····	(307)
公孙丑章句上·····	(327)
公孙丑章句下·····	(347)
滕文公章句上·····	(361)

滕文公章句下.....	(379)
离娄章句上.....	(395)
离娄章句下.....	(415)
万章章句上.....	(433)
万章章句下.....	(449)
告子章句上.....	(465)
告子章句下.....	(483)
尽心章句上.....	(499)
尽心章句下.....	(521)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

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倦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

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